

的 90% 集中发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基地组织似已初步形成跨国的、松散的、网络化的“隐形”一极。它不是国家或国家集团,而是一种跨国的非国家、非政府行为体的行动网络。与美苏两极冷战体制不同,这种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意识形态的“隐形”一极,对美国安全构成另一种更为复杂的挑战。美国无法使用核威慑或现代化军事优势制止“隐形”对手发动的袭击,而且这场不对称战争对美国来说,只有不断出现的敌人却没有结束这场战争的谈判对象,因而其前景难以预料。即便美国从伊撤军,国际恐怖主义针对美国的袭击也不会就此止息。

特点之三:伊战加剧新一轮质量军备竞赛。美国单边黠武,发动伊战,引起一些国家的不安或反应。首先是核扩散趋势:以亲美面目出现的以色列、印度等国努力加强核能力;反美或防美的国家企图拥核,它们不愿成为第二个伊拉克,结果朝核危机、伊核危机交替出现。这两者之间又有复杂的相关性,例如,针对印度拥核,巴基斯坦就要拥核;针对以色列拥核,伊朗便谋求拥有相应的军事手段。假设上述反美的“隐形”一极与核扩散趋势相结合,对美国来说将是一场噩梦。其次,美国虽然在中东陷入困境,但在欧亚的军事联盟特别是高边疆军事部署则在明显推进。原东欧国家、日本、澳大利亚等都被纳入美国的这一体系,结果造成俄美矛盾升级。俄政府视美国在波兰等地的战略部署为“直接威胁”,甚至不惜把《常规武装力量条约》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

特点之四:伊战把世界经济推入高油价和其他资源、能源高位时代。近年来,伊战尚未平息,伊核问题又起,加之黎以冲突等,不断引发国际市场对油价上涨的恐慌。结果,尽管世界石油仍然供过于

求,但油价却成倍上涨。每桶石油价格:2001年底约为 15 美元,伊战爆发后升至 30 美元,2006 年 7 月一度达 78 美元,2007 年 4 月末仍为 67 美元。高油价带动各种矿物涨价。

特点之五:伊战促使美国调整东亚战略,中美日关系改善面临机遇。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为应对苏联威胁曾力图形成美中日联合抗苏格局。伊战后,美国实际上面临比前苏联威胁更严重的“隐形”一极的现实威胁,所以必须竭力避免东亚发生冲突把它卷入其中。从美国全球战略看,欧洲已基本搞定,东亚是具有潜在冲突的不稳定地区,而中东才是当前美国军事战略的主战场。布什政府即便为稳固国内政治地位也迫切需要稳住东亚,以利集中力量控制中东。于是,美国开始让“新保”势力靠边站,把中国作为“利益攸关方”。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对海峡两岸采取“双遏制”战略,一方面对台售武,加紧构筑导弹防御系统,另一方面抑制“台独”,防其挑事;在朝核问题上,美国开始回归民主党的某些做法,解除金融制裁,力求通过对话阻止朝核开发;对日本,在加强美日军事合作的同时,美也采取措施防止日本右翼势力过分嚣张甚或挑起事端。第二份“阿米蒂奇报告”表明,尽管美国对中国仍不放心,但它开始寻求构筑美中日战略互惠、良性互动的新型三边关系,并对海峡两岸三通公开表示支持。

2007 年 4 月末安倍晋三首相访美时,日美首脑一致承认中国对地区和全球安全的贡献,并鼓励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尽管美日政策实质未变,但在同年日美“2+2”会谈中,毕竟没有再把“台湾”作为美日的共同战略目标。如果中美、中日战略对话能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中美日三国将迎来同时改善关系的战略机遇期。○

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新变化

林利民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员)

伊拉克战争对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及相关地缘政

治关系有何冲击? 这是我们观察伊拉克战争及其战

略影响的一个重要视角。伊拉克战争历时四年来,中东地缘政治格局以及欧亚地缘政治格局出现了重要变化,其中有些变化直接源于伊拉克战争的冲击,有些变化虽有其自身固有的战略逻辑,也与伊拉克战争不无关系。

从中东格局看,伊拉克战争极大地改变了中东固有的地缘政治格局。中东所谓“固有的”地缘政治格局,包含三个基本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其内部地缘政治关系相对平衡,包括其东翼两伊平衡及西翼以巴平衡;东翼与西翼两个地缘政治重心并重,保持呼应、平衡;而在整个中东地区,以沙特、埃及等为首的伊斯兰温和势力与以伊朗等为首的伊斯兰激进势力保持大体均势。但是,经过伊拉克战争,伊拉克被打垮,放弃了与伊朗争锋的意图与实力,伊朗力量得以解放出来;同时,美各项不得人心的政策激起中东普遍的反美情绪,扩大了中东伊斯兰激进势力的政治与社会基础,以伊斯兰世界反美旗手自居的伊朗通过宣示开发核武器及向美“叫板”,在中东的影响扩大,而沙特及埃及等温和派国家的影响被削弱。伊朗还积极与叙利亚、伊拉克新政府及哈马斯、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加强战略关系,初步结成了以伊朗为主导的中东反美轴心。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由东西两翼相对平衡向东翼“一头沉”演变,伊朗开始成为中东“超级大国”及地缘政治重心。

中东地区原有地缘政治格局的第二个特点是大国曾在中东保持相对平衡,特别是美苏曾在中东维持均势。海湾战争后这一平衡被打破,美国一度成为中东独占性外部主导力量。美排除中俄德法等大国“压力”而发动伊拉克战争,就是为了进一步扩大这种主导地位。然而,过犹不及,美在伊拉克战争军事行动结束以来的四年中所遭遇的严重挫折,不但使美未能进一步扩大其在中东的主导地位,反而使其陷入“打不赢、输不起、走不脱”的困境。为摆脱困境,美不得不向中俄德法等大国求助,邀各大国参与解决伊朗核危机、伊拉克重建等,而主要大国对助美从中东脱困并不积极,也避免以争霸者的面目与美竞争。结果,中东既未恢复传统的大国均势,美国的“一超独霸”也难以继。美在中东不仅“高处不胜寒”,而且已开始饱尝寒风刺骨。

中东地区原有地缘政治格局的第三个特点是中东内部分裂内斗,长期是承受外部大国争夺的场所及地缘政治客体。然而,经过伊拉克战争及伊斯兰世界的力量向伊朗集中,中东地缘政治主体性有所发展。伊朗与朝鲜、委内瑞拉等世界反美力量合作,向美国叫板,是主动进行地缘政治出击的一次重要尝试,是一次“防御中的进攻”。而“半岛电视台”一再挑战 CNN、“基地”组织等不断向美国及西方利益发起攻击,客观上壮大了伊朗在中东地区外的地缘政治攻势。一个有核的伊朗,其地缘政治主体性和进攻性将进一步加强,这也是美国最忧虑的前景。

从欧亚“大棋盘”看,伊拉克战争的冲击主要表现为延滞了美战略重点东移亚太的步伐。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一书把欧亚大陆划分为西部、中部、南部和东部四大块,他提出美国要控制欧亚大陆,就必须控制其西部、东部和南部,其中“西部”指欧洲、“东部”指亚太、“南部”则指中东。这其实是斯皮克曼“边缘地带论”的新解。小布什上台后,谋求全面调整美国的欧亚地缘战略,减少在“西部”的力量配置,把地缘战略重点东移至苏伊士运河以东的亚洲沿海地区,尤其是亚太。“9·11事件”前成稿的2001年版美《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明确提出欧洲“基本处于和平状态”,俄罗斯对美不再构成“大规模军事威胁”,亚太正在成为一个“有大规模军事竞赛的地区”,美地缘战略重点是“从孟加拉湾到日本濒海带”的亚太地区。报告进而要求大大加强美在亚太的军事力量。然而,“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大大延缓了美地缘战略重点东移亚太的步伐,美被迫把主要力量用于被称作“南部”的中东地区。美在亚太的军队数量虽然超过了其在欧洲的军队数量,但远不及其在中东地区的军队数量,甚至也远不及美在伊拉克的军队数量。不仅如此,在战略对手选择上,美也经历了以中国为对手而不以俄罗斯为对手向以俄为对手而不以中国为对手的变化。这是因为:中国奉行和平崛起政策,在反恐、反扩、伊拉克与阿富汗重建及各种全球议程上积极与合作,中美利益交叉点不断增多;而俄随着经济恢复及政局趋稳,不再对美“低眉顺眼”,甚至利用美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泥潭之机,反攻倒算,包括支

持伊朗与美抗衡等。美尤其担心俄在中亚、高加索及东欧、巴尔干恢复传统影响与势力范围。由于伊朗邻近俄及中亚、高加索、里海和东欧、巴尔干等敏感地带,俄伊合作令美忧心忡忡,伊朗不但成为中东的地缘政治重心,也是美阻俄东山再起的关键阵地,美在伊朗问题上不能松劲。反映在政策层面,美国而在朝核问题上尽可能忍耐,在台海及亚太与中国谋求合作,以便最大限度地集中力量于中东。尽管不少美国要人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战略对手,但美国地缘政治重点依然滞留在中东,东移亚太的进程进一步搁置。

除上述影响外,伊拉克战争及其后果也深刻影响了美国的地缘政治行为模式。冷战后美国相继成功地进行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单边主义与黠武主义恶性膨胀,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二者结合的产物。但美未曾料到拥有高技术、数字化能力的美军在小小的伊拉克面前会一挫再挫。伊战

四年来,美军不断增兵伊拉克,伤亡数万人,投入战费数千亿美元,伊安全局势却不断恶化,美国的软实力及布什政府的声望皆降到低点。美不得不检讨其战略得失,着手调整其单边主义与黠武主义。美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强调根据对方“能力”确定对手,新上任的美国防部长盖茨反其道而行之,开始强调对手的意图比“能力”更重要,这说明美国决策者少了点“牛仔”味,多了点理智。反映在地缘战略上,美国将在贯彻其地缘战略时,较前更谨慎地使用武力,较多地考虑合作安全,尤其会加强与大国的协调,包括继续在朝核、伊核、亚太安全等问题上加强与大国合作等。这对国际地缘政治竞争的内容与方式都会产生影响。当然,美以中东为前进阵地,继续加强与俄罗斯在中亚、高加索及独联体各地争夺的地缘政治战略目前不会有根本性调整,其战略重点东移亚太的步伐也将继续延滞。○

大国格局变化与传统政治的回归

袁 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 研究员)

从国际战略格局角度看过去四年,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那就是美国的实力地位相对下降,非西方世界整体力量大幅提升。一超多强的格局依旧,但单极与多极的较量却出现有利于多极的变化。越南战争后,饱受战争之累的美国曾经遇到过类似的情形,当时其采取的是勇于承认并正面迎接多极世界的姿态。历史似乎正在重演,但此番美国会以何种姿态面对新的多极化蓬勃发展之势?这是观察未来国际政治的主线之一。

美国实力和影响力出现相对衰落,伊拉克战争本身并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在评估伊拉克战争得失的问题上,许多人因为这场战争的结局很糟糕(使美国陷入战略困境)而得出结论,认为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本身就有问题,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明确的目标,伊战在这一点上甚至不如越南战争,因为越战虽然输了,但至少目标明确,那就是打击越共进而防

止共产主义在东南亚地区出现多米诺效应。布什打伊拉克真的缺乏明确目标吗?这种认识值得商榷。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情况则很可能是“旁观者迷,当局者清”。因为布什、切尼、拉姆斯菲尔德、赖斯等“当局者”对发动伊拉克战争是有目的、有战略、有逻辑的,那就是:以伊拉克为突破口,全面肃清极端伊斯兰主义赖以生存的土壤,从根本上解决恐怖主义威胁问题;以伊拉克战后重建为起点,全面铺开所谓大中东民主化改造,构建所谓“新帝国”;以伊拉克战争为契机,进一步深化美国军事转型,进一步“回报”美国军工、能源集团的政治支持。事实证明,伊拉克战争在推动美国军事转型、抢占地缘能源战略空间、拉动美国经济发展方面是有所斩获的,情况远没有人们说的那么糟。问题是,从美国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看,这场战争未必切合实际,未必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总体布